



《万松浦》历期封面画作之一《整个夏季》 闫平作

小说梗概

刘小雨多年来对非洲魂牵梦萦,婚姻的困境让她终于下定决心只身前往非洲。她关闭社交账号,重拾画笔,并雇用了肯尼亚当地女子玉妮丝做保姆和模特。刘小雨教玉妮丝做中餐,玉妮丝带她体验当地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文化、志趣不同的两个女人找到了自我,完成了彼此的救赎——肉体与灵魂的边界,就这样在颜料与尘土间变得模糊不清。

■创作谈

一只蝴蝶的启迪

□张翎

对非洲大陆的向往,始于很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在文字中遭遇非洲,是在三毛的撒哈拉系列和海明威的非洲狩猎故事中。那时的我天地刚开,眼界尚浅,三毛文字里记录的非洲日常——那些荒凉中的炽热,夹着沙子的温柔,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诱惑和震撼。而在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里,我第一次看到死亡像一座雪山,庄严地站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人类的孤独、尊严与失败,都在那个白色的高处找到了某种解答。从那时起,我知道非洲不仅是自然的异域,也是一道灵魂的终极风景。那些文字叠加在我年轻的心中,铸成了一个非洲梦。梦境里是一个充满奇异光影的所在——辽阔的草原、燃烧的落日、走在尘土中的动物、赤脚而歌的孩子,还有某种隐隐牵动神经的神秘气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抵达那片土地的,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是在几十年之后。

过去几十年里,求学、谋生、写作占去了我生活的绝大部分空间,非洲的召唤如同暗夜里的烛火,时而强烈,时而微弱,却从未熄灭。2024年夏天,我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在赤道之国肯尼亚居住了一个多月。虽然那也还是一个走马观花的过程,但我尽量避免只做旅游巴士上的观光客。我伸出身上的每一根触须,扎入那个环境,吸吮那片土地里的生命营养。

在肯尼亚逗留期间,我去了两趟马赛马拉草原,近距离观看了莽莽原野上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活状态以及惊心动魄的动物大迁徙过程,并访问了至今持守古老生活传统的马赛部落。我走访了世界上十大贫民窟之一的基贝拉,在那些狭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泥屋窄巷间,感受到了文明的另一种深度——不是进步的指标,而是生命的韧性与尊严。我也去了当地的农场,亲眼看见了咖啡、茶叶和玉米种植者的艰辛日常。我结识了一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女性,她们多数是单身母亲,在男人缺席的状况下,养大儿女,维持家庭日常。她们平静地接受了无法改变的生活现状,极少有怨言,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快乐。

她们身上这种天然质朴的务实精神,是我塑造玉妮丝这个形象的基础色调。

也是在那次旅途中,我认识了一些在肯尼亚生活的华人家庭。他们已在非洲生活多年,或开餐馆超市,或开工厂,或经营旅游业。通过他们,我也近距离接触到了一群进入华人家庭的当地工作人员,或是保姆,或是司机,或是门卫,或是伙计。在肯尼亚华人家庭中,保姆是标配式的存在。有的保姆和雇主家庭相处多年,照料雇主的孩子出生长大,已经是家庭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有的保姆则像隐形人一样生活在雇主家中,安静地做着日复一日的家务。她们与雇主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的种种差异,误会、提防、碰撞几乎是每天的现实。

在华人朋友家里,我亲眼看到从未见过螃蟹的保姆,把主人从中国超市买来待客的螃蟹的钳子全部剪去,将蟹盖连同里边的蟹黄丢弃,只留下一个白白净净的圆身子。我也听说了保姆在厨房里制造的种种可笑场景:把巧克力包进面团,作为饺子端上新年的饭桌;在从未用过的炸锅里,把鸡翅炸成了几团焦炭……我还从不同的渠道听说了一些关于保姆、司机“手脚不干净”的故事。我开始思索,在不同的文化里,是否存在着对“分享”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社会环境里,“顺手牵羊”也许仅仅是对“分享”这一概念的模糊扩充。回想起少年时在工厂做工的日子里,我也曾用工厂的原材料,给自己车过花瓶和压蜂窝煤的模子,我从未把这样的行为想成是一种“窃取”。这些细节,这些带着疑惑的思考,后来都被我一笔写进了《赤道之渡》里。

在非洲的旅途中,我已经感觉我大概会写出一些关于这群人的文字。但这种感觉是隐约的,漂浮不定的,似乎还在等待某一个呼之欲出的契机,把它落到实处。有一天,我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做客,看见她年轻的非洲保姆正在阳台上熨烫衣物。她手法娴熟,动作机械,仿佛一

生一世都在做同一件事。阳光照射到她身上,在她的头发和脸庞上涂抹了一层金光。熨斗的蒸汽升腾起来,她的手指被烫了一下,她甩了甩手,突然,一只蝴蝶从她的指尖悄然飞出。蝴蝶绕着她的身体飞了几圈,最终翩然远去。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只觉得心里有一种电闪雷鸣般的撞击。在那一瞬间,我听见了故事的召唤。那只蝴蝶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使者,让我在这个看似沉闷、重复甚至被忽视的生命之中,发现了一股神秘力量的流动。那一幕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那个百年家族的故事中,现实的日常与死亡的气息并存,灵魂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交融、重叠、缠绕。那一刻,玉妮丝的灵魂已经诞生。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只是在为那个灵魂塑造肉身。

从非洲归来,文字开始慢慢生出。先是纪实的散文系列,记录了在肯尼亚逗留期间的日常生活日常。后来,开始了《赤道之渡》的酝酿过程。小说中,一位名叫刘小雨的中国女子,为逃离婚姻困境,来到了赤道线上的肯尼亚,试图开启一段新生活。她卸下去,在遥远的他乡寻找失落的自己。和在肯尼亚的许多华人一样,她也雇用了一位当地保姆。于是,原本没有任何契机相遇的两个人,被命运带进了同一片屋檐下。她们互不信任,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相逆,连吃饭都无法同步。这一切并非荒谬的杜撰,而是文化差异在生活最细处的真实折射。这些摩擦,正是我想在小说里细细展开的部分——不完全是为了制造故事必需的矛盾冲突,而是想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慢慢穿透表层,看见隐藏在生活背后的“人”的共同底色。

小说最后揭示了一个灵异的真相:那位非洲保姆玉妮丝,其实早已在一次“马塔图”(肯尼亚的私人营运小巴)事故中丧生;而女主人刘小雨,最后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正是死亡让她们看见彼此。也正是死亡,让一切俗世的细节彻底剥落,只剩下两个灵魂赤裸相呈。死

亡让她们回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渴望被理解,渴望爱,渴望完成未竟的梦。玉妮丝终于在死后找到那个生前暗恋的男人,成就了她们一生最简单的愿望:得到一个她永远得不到的男人。而对刘小雨而言,她完成了生前一直想做而始终没有勇气完成的事——抵达那片魂牵梦萦的非洲大陆,并在那里完成她梦想中的画作。两个生时被环境所困的人,终于在死后完成了“越狱”。只有明白自己是死魂灵之后,两人在生前所有经历的语言文化矛盾,才终于化为无关紧要的飞尘,灵魂的真实对话由此开始。

我选择用“死亡”作为小说的结尾和一切悬念的落地之处,并不完全是为了制造戏剧性的反转。这个结局的设定,其实也部分回应了非洲文化中对死亡的另一种理解。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中,死亡经常意味着终结和伤痛,意味着对生活的不甘和不舍。而在非洲文化中,死亡常常被视为一种通道,是灵魂抵达另一种存在的方式。那种对死亡的自然接纳与敬畏,让我反思我们对生命意义的局限理解。也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渡”的真正含义。《赤道之渡》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穿越,也不仅是一个跨越文化的旅程,它更是一种灵魂的过渡,是一场关于认同、原谅、理解、回望的内心远行。

《赤道之渡》不只是一个非洲保姆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为情所困的中国女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他者”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梦境,在这个梦里既有未知的他者,也藏着未知的自己。当刘小雨在异乡遇见一个看似全然不同的人,当她与玉妮丝在语言的混乱、行为的误读中一次次试探对方时,其实她们也在发掘一个深藏在自己身体里的、陌生的自我。那种“灵魂的碰撞”,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只有当她看见那个“陌生的自己”时,她才真正完成了“渡”的旅程。

《赤道之渡》是我第一部关于非洲的小说,希望它不是终点,而仅仅是开始。我还想继续探讨非洲,探讨异乡和他者,还有我们都还未完成的自己。

■编辑手记

《赤道之渡》:跨越时空的造筏与渡津

□王月峰

丰富的细节

第一次拿到《赤道之渡》时,开篇的一段话便牢牢锁住了我的视线:“一万年前就想来非洲了。这话不是编的。十五岁那年——感觉离现在的确已经过去了一万年。”短短几十个字,就将巨大的时空跨越呈现给读者。紧接着便交代女主人公刘小雨因婚姻中的窒息,从中国的江南逃到赤道上的肯尼亚内罗毕。由此,我初步判断这是一篇关于刘小雨在万丈红尘中修行的救赎之旅的小说,开篇之后的很大篇幅验证了这个想法。张翎笔下的空间,向来不仅仅是故事背景交代,而是人物心底真实的追寻。

在三线城市的普通中学教了十几年美术课的小雨,打算从精神和肉身两个层面打造自己的救赎之筏。在精神上,她关闭了所有与外界的沟通渠道,重拾画笔,重拾自我。在肉体上,一方面,她的行李箱里带了足够的药物和医疗器械,以保证“在这块土地上经受四季轮回,承受每一季的阳光尘土和风雨”;另一方面,她准备的衣物“为荷兰筑起了一道绝缘的高墙”,她“赤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头发脏得起了结子,口臭可以熏倒盆栽”,她抛弃了“女性”肉体上取悦他人的部分,只为自己。我们还将看到,刘小雨在此后的生活里,眼耳鼻舌身肆意成长,遍地开花,她甚至为了眼睛和耳朵能“长出触角、生出根须”,扎根在这片异域的大陆上,花钱雇了一个当地女子玉妮丝做保姆。

对于日常细节的描绘往往是小说创作的难点和精华之处,《金瓶梅》《红楼梦》和《追忆逝水年华》正是这方面的巅峰之作。《赤道之渡》中对

肯尼亚生活极为细腻的摹写深深吸引着我,这是感官世界的盛宴,色声香味触,琳琅满目——

刘小雨深爱绘画,她对细节的敏锐捕捉伴随着救赎之旅前行。她惊诧于玉妮丝收拾家务时的动作,蝴蝶停歇在玉妮丝头巾上的瞬间,成为刘小雨梦想绘就的画作《头顶着蝴蝶的洗衣妇》的灵感之源。

张翎写色彩,比如第一次描写玉妮丝的穿着时,“头上缠的橘红色头巾,天窗漏下的日光在上面咬出了几个白色的洞”“身穿一件街上随处可见的花布裙子,脸上隐隐泛着一层青釉般的光泽”;写刘小雨“疯狂地实验着各种颜色的交融和变化,在黑上面蛮横地堆积黄和绿,在红上面毫无节制地叠加不同饱和度的蓝,在灰上面一笔一笔地刷着更浅层次的灰,直至灰演变成了银”;写“五花八门的豆子,色彩斑斓得像画”等等。

写声音,异域的语言交流,乘坐“马塔图”在基贝拉的街头听到的嘈杂混乱之声——摇滚乐、叫卖声、车辆喇叭声、鼎沸的人声……

写各种美和不美的食物以及由此引发的视觉与味觉冲击,如猪肉萝卜、西红柿鸡蛋、炸鸡翅、蒸玉米和地瓜、海鲜、肯尼亚人的家常饭咖喱里、巧克力馅的饺子、豆腐面等。写神秘的当地植物 Miraa,“带着青草的微涩,又有一点发酵过的酸。渐渐地……苦味变得浓烈,苦里又带着一丝怪异的甜。再后来……苦意渐渐隐去,有了一丝微微的清凉”。香料市场里,“深黄的姜黄、深红的辣椒粉、褐色的肉桂,还有淡绿色的干香菜籽……一阵风吹过,鼻子抽搐,眼眶微热”。

写身体的各种感受,有想象的、回忆的和当下遭受的。比如刘小雨乘坐“马塔图”受伤后的感触,“心脏像泡过了水的木耳,突然涨得很大,

蛮横地撞着我的胸腔,轰,轰,轰,轰,响得我什么也听不见”。

……
当下切实可感的细节时常会呼应刘小雨遥远的窒息的婚姻生活。各种食物呼应着厨房手艺不错的丈夫却从不给自己做饭的过往,玉妮丝一家在刘小雨受伤后的悉心照顾则呼应着丈夫对她的各种漠视。这些描写都在昭示,刘小雨“活”过来了,这一切还要感谢她的保姆玉妮丝。在内罗毕这套租住的公寓内,刘小雨与玉妮丝在逐渐磨合中产生深深的情感纠葛,她的救赎之筏扎得细密结实,自赎之旅曲折却向前。玉妮丝是这艘船上的另一位水手,不但成了刘小雨随叫随到的模特,还在生活和精神上给予刘小雨越来越多的帮助。

丰富的细节只是偌大的树冠,我赞叹着它的秀伟,欣赏着某一丛绿叶的精致,终于透过层层枝叶看到了它的主干。

戏剧化的转折

在小说篇幅超过三分之二之际,我感觉故事应该会触及这类异域题材必将涉及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了吧?果然,这部细节呈现完美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故事理所当然地走向预料之中。

刘小雨和玉妮丝在重大价值观上出现了分歧:刘小雨主动抛弃了婚姻;玉妮丝被前夫抛弃,却一直梦想回归婚姻,而且机会就在眼前。“我终于明白了……即使有过短暂的交会,但在宇宙众神的长远计划里,我们必定会各行己路。”同时,刘小雨发现了玉妮丝“偷”东西的“罪证”——刘小雨在生日那天丢失了一盒鸡蛋和一把白芸豆,

原来是被玉妮丝拿到了回归家庭而举行的小聚会上。即使刘小雨明白玉妮丝的行为是不同文化对多余物资共享的不同理解,但仍感觉被这艘救赎之船上唯一的“战友”背叛了。雇用玉妮丝之初,房东那“最紧要的,是看手脚干不干净”的警告如千里伏脉,此刻隆隆作响冲出地表,冲击着二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刘小雨的救赎之筏没出于风波之中,摇摇欲坠,脑海中的“黑蛇”“一整个夜晚都在我的耳边嘶嘶地絮叨”,玉妮丝在她们“共享的记忆中投了毒……人生就是一场不讲道理的破坏性实验”。

故事即将发展到巅峰,我压抑着迫不及待地要翻看结尾的冲动时,却被接下来的情节击中:刘小雨在寻找玉妮丝更多“罪证”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玉妮丝是魂灵的真相——玉妮丝早已在一次“马塔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刘小雨的救赎之筏此刻仿佛突然冲破风雨迷雾来到充满神性的水域,她再次看到玉妮丝身上飞出蝴蝶,在知晓玉妮丝的本名后,她的画作终于顺利完成。

杰作的全貌

刘小雨坦然接受玉妮丝是魂灵的事实,一人一灵静坐于非洲大陆奇异的黑夜中,孔雀的叫声带来异域的安宁。一个人何必跟一具魂灵较真呢?我想,结尾就是这样的吧?刘小雨在和玉妮丝的交往中,在异域走完自赎之路,到达心灵的彼岸,毕竟她的画作已经完成。平心而论,这段情节确实给人惊喜,魂灵的设计极为契合非洲大陆的神秘,它与前文大量的写实细节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比。

济南酷热的空气从大楼隐秘的缝隙透入,似

乎和赤道遥相呼应。在我以为已经看透这部小说时,我又发出了一声惊呼:在离结尾不到500字的时候,《赤道之渡》终于显露出它作为佳作的全貌。可谓,“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刘小雨所扎的救赎之筏远远不是对现实婚姻的逃避和奋起,所渡过的也不仅仅是中国到非洲的巨大物理空间,赤道在小说中化作生死临界,是玉妮丝解开了全部的真相——刘小雨已经去世两个多月。

我一边赞叹,一边不得不把之前的阅读感受大部分推翻,站在刘小雨“死于宫外孕”的新角度上重新审视全篇。刘小雨死后仍然纠结于生活的桎梏,她怨恨丈夫的冷漠,怀念妈妈做的豆腐面,面对玉妮丝的“背弃”五味杂陈——死亡暂时没给她带来解脱和大彻大悟,那什么才是她的救赎之筏,它又将驶向何方?

我想,有一点是明确的,“死亡”的故事仅仅是读者渡津的码头。在读者这里,刘小雨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